

文白对照

资治通鉴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白对照

# 资治通鉴

第一册

主编 萧 枫

第一卷至第四十六卷  
周威烈王至汉孝章帝(前 403 - 公元 76 年)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白对照资治通鉴/萧枫主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10  
ISBN 7-5034-1201-1

I.文... II.萧... III.资治通鉴—译文 IV.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876 号

### 文白对照资治通鉴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6 开 284.75 印张 7000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 7-5034-1201-1/K·0830 定价:1680.00 元(全六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 《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编委会

顾问：廖盖隆 陈克明  
主编：萧 枫  
副主编：高选民 袁 牧 于慈云 陈 征  
编委：高经纬 王光君 王恒伟 张 瑞  
        王福选 吴继金 张建成 梁建平  
编译者：孙春生 张善轩 张 瑞 杨 莹  
        王 辉 李伯承 张建成 梁建平  
        马启民 周恩毅 田 刚 吴继金  
        荆立萍 王福选 何致武 柴观珍  
        巩玉芹 刘旭扬 袁 牧 郭建民  
        金顺廷 华晓舍 刘秋海 郁兴建  
        祝红文 张俊民 王维宏 杨林森  
        范智学 肖抗旭 李成吾 徐冬孚  
        李光勋 韩爱东 杨维柱 于慈云  
        范建效 徐兆才 农鸣志 赵建中  
        梁前进 贾孟檄 陈惠吉 李中维  
        何雁鸿 瞿爱社 王炳林 荆郁文  
        巍中伟 周海涛 沈岩文 何忠民  
        田 禾 张德天 王吉伟 袁贵才  
        王龙佩 萧何放 尚人杰 姚学高  
        向吉才 雒南涛 康铎伟 李乐平

侯子建	黄伟建	任子斌	马兆里
曹寓睿	仝大东	谢东俊	付清学
徐李阳	董新建	赵维功	刘良梓
许珠乾	郑春礼	谢世和	唐有志
钟 谦	李明军	王春英	李树潮
徐 峰	徐中杰	张文灿	伊 鑫

# 总 序

邵 华 泽

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其成就达到古代编年体史书的高峰，堪推千古不朽之作，后代史学家们纷纷进行仿效续纂，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部丛书中，形成一套完整的《通鉴》体系。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等，而王夫之《读通鉴论》，乃是通鉴书系中之珍品。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领导刘攽、刘恕、范祖禹等，经历十九年艰辛创作而完成的一部杰作。本书上起战国（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公元959年），记事1362年，共294卷，约380万字。司马光在他的《进书表》中叙述了他编写这部集千余年历史要件的史书，目的是为皇帝提供封建统治的经验教训，故宋神宗认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赐名为《资治通鉴》。由于这部书收罗宏富，博大精深，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无所不包，可谓一书在手，尽窥千古之废兴，万事庞丛，得悉内中之秘要。故这部书成为所有宦商民、文人学士的案头必备之物。

《续资治通鉴》则是在清·康熙年间徐乾学邀请万斯同、阎若璩、胡调等纂成《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的基础上，后乾隆年间，又由当时湖广总督毕沅，在著名学者邵晋涵、章学诚等人帮助下历时二十年撰写成二百二十卷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该书承接《资治通鉴》，起自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终至元朝至正三十年（公元1370年），共409年的历史，综合概括了宋、元时期的主要史实。

《明通鉴》是清末学者夏燮，费时二十余年完成的著作，本书记载了自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至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共313年的历史，记载了明朝由兴盛到衰亡的全过程。

《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和《明通鉴》三部编年体巨著记载起自战国时期到清康熙三年的全部历史，共达2066年。记叙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等重要朝代的兴盛衰亡。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也包括最黑暗时期）尽收于此，应该说是一部具有相当权威性的中国古代通史。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王夫之的史论名著。这部著述反映了他的史学、哲学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和认识水平。而更重要的是，此书以《资治通鉴》为素材，鞭挞入微，放言纵论，其思想价值就越发令人瞩目。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经历数千年岁月沧桑仍保持一脉相承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在这座人类巨大的思想宝库里，聚集着人类社会文明、美好、善良和智慧。几千年来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哺育和鼓舞着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使我们这个民族延至今天，能够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当我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即将踏上21世纪征程的时候，更加深切地感到建设新时代精神文明大厦的重要

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从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智慧，这是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发展规律，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去实现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郑重地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和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邓小平同志也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还说：“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江泽民同志曾在多种场合号召全党“认真地读一点历史”，强调不了解中国历史，就不能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业式的讲话中又强调：“学习历史，有助于开阔视野，鉴往知来”。他说：“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话很有远见，也很有分量。实践证明，历史能教人温故知新，慎思明辨，决定行止。学习历史，对于培养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和情操，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都有不容低估的作用。

鉴往而知来，读史以明志。要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并预见未来、开拓未来，就必须深入研究历史。一切执政者，为了治国成功，也必须借鉴前人和他人的经验教训。这就提出了一个任何时代凡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必须关注的问题：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我所用。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于悲痛、缅怀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镜”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通鉴”之所以为鉴就是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历史借鉴。人类社会，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但人类社会活动则有其共同的规律。尽管今天我们的社会同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不相同，但是，历史上的许多做法及其效果，即成功和失败，乃是可以借鉴的。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即此意也。譬如，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凡是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时，社会就容易发生动乱；凡是社会发生动乱时，必然导致生产力的破坏。所以，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大臣，以至各级官员，都要采取措施，缓和社会矛盾，推进生产力向前发展。而一些昏君、墨吏，则又用他们的暴虐行为，加剧社会矛盾，阻碍生产力发展，最终导致王朝覆灭。不同性质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也不尽相同。但至少从普遍性的历史规律中可以得出结论，即任何一个政权，只有立足于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才能促进社会安定，推动历史前进。此点千真万确，丝毫不容怀疑。当然，从总的方面看，历史借鉴要谨慎，分析要有科学根据，结论要实事求是。毛泽东是善于用历史作借鉴的。例如，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民主集中制时曾说：从前有个项羽，“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而刘邦则“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

的意见”。“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接着他批评当时有些领导干部“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这种借鉴是直接的，针对性是很强的。1944年正当进行中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发给全党学习。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李自成是明末著名农民军领袖，进入北京城后，其部将骄傲，将士不受约束，贪污腐败，很快遭到失败。这个历史教训，不仅对于领导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共产党来说是很好的借鉴，对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来说不也是很好的借鉴吗！可惜毛泽东到了晚年，也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动乱，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重大损失。

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技进步、知识创新和宏观驾驭能力的竞争，表现为人的素质的竞争。各级领导干部如果能持之以恒，不断用包括历史在内的各种知识武装自己，就能减少失误，在各种挑战面前处于主动地位。

有鉴于此，组织编译并出版文白对照全注全译《通鉴系列史籍》，确实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件大事。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通鉴系列史籍》可以说是集各方精粹之大成，是古代典籍中之精品。本书的出版发行将有利于向广大干部群众普及历史知识，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能使后人继续受益，即有利于子孙后代。在改革开放、中外频繁交往的时代环境里，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伟大祖国的事业中，向各级领导干部和政策研究者、历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以及一切对历史有兴趣和关心政治的人提供一部系统的中国通史读本，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 前 言

## 一

“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大学者——王充对古今关系的精辟见解。我们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书，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让人们通古知今，知今通古。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历史的伟大国家，历朝历代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又是具有尊史、学史和治史传统的民族。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从历史中学习知识、智慧和经验，同时，又在社会实践中用新的知识、智慧和经验丰富和完善博大精深的历史。千百年来，许多志士仁人为总结我们民族的历史经验，提高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资治通鉴》就是其光辉典范之一。

探索深厚久远的传统文化积淀对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形成的巨大作用，认识和发掘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生活及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是历史对炎黄子孙提出的重要课题。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文献典籍进行揣摩、研读和消化。真学历史，学真历史。但是，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文献宝库面前，人们不免有眼花缭乱、不入门径之感，以至往往望而却步。不仅如此，由于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内容的变化，加上语言的隔膜，当代读者阅读古代典籍，也甚感困难重重。有鉴于此，我们从浩繁的历代史籍文献中，撷取了司马光所编的《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进行注译编校，奉献给广大读者。

## 二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代杰出的史学家。平生著作颇丰，仅《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就有三十七种，流传至今，在《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有十六种，其中《资治通鉴》是一部最有影响的史学名著。与《资治通鉴》有关的还有《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一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按朝代为纪，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记》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资治通鉴》自太平三年设局修撰，直到元丰七年全书完成，前后经过了十九年。此书修纂

除参酌正史外，还参阅各种典籍多达三百余种。《资治通鉴》创编年体通史规模，以时间先后叙次史事，使历史的发展变化、前因后果有个系统、明晰的交代，对重要的史事，根据各种的史料，采取追叙或附叙的手法，使事件完整地表达出来，避免或减少因以时间为序造成的史实分散割裂的弊病，被后人誉为“叙之井井，不漏不烦”。除叙述史事外，还有分析、评语，或引他人语，或题“臣光曰”，不论是叙事，还是评论，皆无一语无所本，繁简适宜、文浅事明。《资治通鉴目录》以年表的形式编成，实际是《资治通鉴》概要。《资治通鉴考异》是对史料的考辨情况的记录，而《考异》的撰成，使考异从此成为一种史书撰述体例。《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现存的最大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在该书的《进表》中说其宗旨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所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部巨著受到历代政治家和史学家的高度评价。宋神宗早就说它“贤于荀悦从汉纪远矣。”南宋学者王应麟评价该书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为通鉴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也说：“此天地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一代伟人毛泽东评价这部巨著，“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本末毕具，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可见此书影响之深远。

### 三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在我们的伟大祖国跨入 21 世纪的关键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重新腾飞的历史使命要求国人必须进一步提高整体素质。无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邓小平理论是我们中华民族当代的伟大思想旗帜，我们必须努力学习这一理论和思想体系。同时我们也需要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古代典籍的宝库中，寻找可以借鉴的营养。

如何提高全体国民和领导干部，尤其是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素质，提高他们在治国、治军、治人、治事、治学、修身等方面的能力和参政议政的本领，方法固然很多，而其中一条重要且便捷的途径，就是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的经验。诚如古人所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也就是说，要使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民众都能以中华民族历史宝库中的宝贵经验和深重教训为镜子，对照和联系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扬史之所扬、光史之所光、忌史之所忌、弃史之所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作出符合国情、民情的决策，达到修身、治家、创业、建国、安天下的目的。

江泽民总书记 1998 年年初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殷切希望各级干部和全党同志“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他还着重讲了关于学习理论、学习现代经济知识，学习科技知识和学习历史四个方面的问题。为了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响应江泽民总书记的号召，努力学习历史，从历史中吸取营养，提高自身素质，开拓视野，鉴往知来。实践证明，历史能教人温故而知新，慎思明辨，决定行止。历史对于培养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和情操，对于国家的治乱兴衰、得失成败，均有不容低估的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在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时指出：“古往今来，一切有志有识有为之士，都能够把握自

己，以不沉醉于金钱、美女和权力为诫，而凡是沉迷于声色犬马，没有不玩物丧志的。这方面的古训很多，值得重视。”“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形势下，有些党员和干部放松了自己的学习、修养和改造，头脑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少了，而个人主义的东西多了，受腐朽思想的影响多了，对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已分辨不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不迷失方向、走到斜路上去的？”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除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经受锻炼外，还要自觉地学习历史，以史为鉴，保持清正廉洁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经得起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

江泽民同志曾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业式的讲话中又强调：“学习历史，有助于开阔视野，鉴往知来。他说：“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资治通鉴》可以说是集各方精粹之大成者，是古代典籍精品之中的精品。可谓一卷在手，尽窥千年之得失，千古之兴废。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人的素质的竞争。各级领导干部如果能不断用包括历史在内的各种知识武装自己，持之以恒，就能在时代发展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

鉴于此，我们组织编译了《资治通鉴》，从而有利于通过学习历史，以史为鉴，培养人、造就人，促进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促进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

本书在译注点校过程中参考了各种校点本，主要有中华书局的《资治通鉴》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译文中古代纪年后加注公元纪年，地名加今地名，官名直录不译，以免造成理解偏差。本书集数十位文史学界同仁之合力，历时数载，共同完成。由于译注工作出自多人之手，虽力求文气贯通，但难免风格各异。《资治通鉴》博大精深，所论纵横千年，含融万象，因学力所限，译注中难免会有一些疏漏不确之处，望前辈方家多多赐教。

本书编委会

2002年6月28日

# 毛泽东与通鉴

廖盖隆

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始终同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刻的联系。中国历代的史书是毛泽东最喜爱读的。特别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撰著的《资治通鉴》，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他一生共批阅《资治通鉴》十七遍之多。他曾说：“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他多次向各级领导干部推荐这部好书。

## 读《通鉴》而退学自修

1910年，少年毛泽东在韶山东茅塘读私塾时，从塾师毛麓钟那里得到一本《纲鉴易知录》。《纲鉴易知录》是《资治通鉴》的简化编印本，由清康熙年间的吴乘权、周之炯、周之灿编纂，是一部简明的中国通史读本。这本书使毛泽东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2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由于其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他的国文老师胡汝霖感到惊奇，特地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借给毛泽东看。《御批通鉴辑览》就是《四库全书》中的《御制评鉴阐要》的另一个书名。清朝乾隆皇帝在读《资治通鉴》时写下了800多条朱批，乾隆的一位臣子把这些朱批编印出来，就名为《御批通鉴辑览》。

青年毛泽东读史入迷，习惯在书上圈点批注，竟不知不觉在老师借给他的这本书上作了不少圈点和批注，当毛泽东以负疚和不安的心情还书时，老师胡汝霖不但没有批评他，而且还把这部自己珍爱的书送给了毛泽东。不久毛泽东写了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引起了很大轰动。“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见于《资治通鉴》卷二。毛泽东的作文一方面高度赞扬商鞅是“利国福民的伟大政治家”，指出商鞅的变法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虽然他当时还未超出改良主义的藩篱，但一个十几岁的青年学生，对历史和现实有如此深刻的思考，且行文流畅，逻辑清晰，实为难得。老师给他打了一百分，并批示“传观”，称赞毛泽东“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胡汝霖老师送这部书给毛泽东，大概只是鼓励毛泽东读史论史，写出好文章来，但对青年毛泽东来说却起到了老师所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他竟因而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起了这件往事：“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之后，得出结论，不如自学更好。

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执行自修计划、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很有价值。”从这里可以看出这部书同毛泽东后来关系之大了。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这部书，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志去看。

青少年时期毛泽东读通鉴的这两则轶事，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在当时，恐怕是毛麓钟和胡汝霖这两位老师所没有意识到的。

## 从《通鉴》中学习历史智慧

在建国前，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主要是侧重于军事上和思想上。毛泽东在1936年撰写的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仅引证了军事家孙子的言论，还引证了《左传》、《资治通鉴》所记的一些有名的战例。1938年，毛泽东在另一部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再次引用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战例，用以说明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战争的结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到战略退却问题，曾引证了齐鲁长勺之战，认为这虽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他接着指出：

中国战史上含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这里所举出的从汉初到东晋的6个战例，历代正史都有记载，但材料分散而又不连贯，《资治通鉴》因是编年体而能把战事的发展按时间脉络表述出来，加之史笔精彩而又凝炼，故大多比正史写得更出色。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举了这六个战例，并加上晋楚城濮之战、韩信破赵之战，认为这些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的局部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这里说的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的一次大战，《左传》写得很精采；韩信破赵之战发生于汉初，《史记》有记载，《资治通鉴》也描述了此次战役。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著作提到《资治通鉴》所记战役，不止这两处，但以这两处为最集中。这两部著作分别写于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和后一年，它们对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以至于解放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之处，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总结了他领导军事斗争的实际经验，另一方面是他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军事思想和传统史学关于战争描述中所包含的智慧。毛泽东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并升华为理论形态，创造了科学的同时又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军事理论。

当然，毛泽东与《资治通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注意到它对战争的描述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战略战术原则。他在讲到别的问题的时候，也曾联系到《资治通鉴》的人和事，作为一种比喻或一种根据。1939年，毛泽东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中，一方面表明“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一方面又尖锐指出也有

一些人“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李林甫，新旧两部《唐书》都有他的传，记载其为人阴险事甚具体，而“口蜜腹剑”之喻则出于《资治通鉴》卷215唐玄宗天宝元年所记，其文曰：“李林甫为相，……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陷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毛泽东借用《资治通鉴》上的这个记载来比喻那些“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帝国主义者，是既形象而又恰当的。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这部著名的哲学著作中，为说明片面性的不对，他引用了孙子和魏徵的话，指出：“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魏徵的话，取自《资治通鉴》，其原文为：

上（指唐太宗）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请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之变。是故人君兼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兼听可以兴邦”，“偏信导致亡国”，魏徵主要是从政治得失上来说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则赋予哲学的含义，其意义就更加深刻了。

由以上二例可知，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关注并不仅限于战争的记述，这里所强调的只是：由于客观时势和毛泽东所处地位的缘故，他更多的关注于战争方面。

## 从通鉴中汲取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系统地、反复地阅读《资治通鉴》，而他对《资治通鉴》所记史事的关注，则已超出战争方面而着眼于整个历史经验教训了。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亲自交给历史学家吴晗两项学术工作，一项是要吴晗主持改绘清人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再一项就是要吴晗主持标点《资治通鉴》。标点《资治通鉴》在1956年就完成了。毛泽东读《资治通鉴》，主要用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个点校本。

毛泽东在向吴晗提出请他主持标点《资治通鉴》时，讲到了对《资治通鉴》的看法。毛泽东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的评价，所谓“写得好”，主要是指此而言。这是讲《资治通鉴》。这部书本身。接着，毛泽东提出了我们应当怎样读这部书？就是他说的“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三句话十分重要，也是有逻辑联系的。所谓“批判地

读”，是从立场、观点上说的。所谓“借以熟悉历史事件”，是从增长、丰富历史知识上说的。所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就是要以历史为借鉴，从而通过史书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意识到，毛泽东在1940年前后几次强调“不要割断历史”的观点，从他对《资治通鉴》的评价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其次，毛泽东历来强调历史知识的重要，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历史知识的话，又怎能达到“从中吸取教训”的目的呢？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喜好，是不能仅仅从他个人的兴趣、气质来说明的，其中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深刻理解，是他对于现实和未来所具有的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反映出一代伟人的政治情怀和伟大的历史感。

### 批注《读通鉴论》

毛泽东不仅喜爱《资治通鉴》，也很喜欢与《资治通鉴》相关的其它史书、史论。其中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就是他认真研读、批注过的一本史论名著。

明清之季的史学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一部结合《资治通鉴》所记内容而对历史作比较全面评论的杰作。他对于“资”与“治”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述。他写道：

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已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已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今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资，惟在一心，史特其鉴也。（《读通鉴论·叙论四》）

王夫之说的“一心”，是指要有自觉的意识。有了这种意识，那么得、失、同、异，都可以作为治之资，历史对于现实就可以起到借鉴的作用。我们可否借用王夫之的这些话，来理解毛泽东说的“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呢？

毛泽东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中批注：“申韩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在卷十七《梁武帝》中批注：“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

毛泽东所批的几段话，比较明显地反映出王夫之对道家的黄老之学、法家的申韩学派、儒家的孔孟学派诸家治术的看法。孔子、孟子的政治思想以“仁治”为主要内容。黄老之学，是战国、汉初的道家学派，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推崇“清静无为”的治术。申韩指战国后期的申不害和韩非，他们是当时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特别喜好谈君王驭臣之术，所谓“术”，就是循名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则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记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当时皇太子拓跋宏刚5岁，因为年纪太小，于是就想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拓跋子推沉雅仁厚，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可群臣和宗室都不同意，有人甚至说，如果陛下舍弃太子，另立亲王，就要

当庭自杀；有的说今后要以死奉戴太子。最后，拓跋弘表示：“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自然就把皇位传给了拓跋宏，是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弘自己则去当太上皇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还说，明帝自己没有儿子，就把各亲王怀有身孕的姬妾秘密接到宫中控制起来，若生了男孩，就把生母杀掉，由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立为太子的刘昱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的妃子同嬖人李道儿生的，然后由他收为养子，当时刘昱还年幼。明帝害怕自己的弟弟们篡权，就把他们一一诛杀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豫元年》又记载，宋明帝在自己病重时，“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相，门族强盛，或有异图”，就派人把他毒死了。有一次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豫章太守刘悛谋反。”醒来后他就派人把刘悛杀了。

王夫之把北魏献文帝和宋明帝传位于子的方式放在一起评论，这就是前面“原文”引述的第一段。他认为，拓跋弘并不是真想把皇位禅让给叔叔拓跋子推，而是担心自己身后，儿子受制于拓跋子推，江山不稳，故用黄老的诡道诈术，欲取先予，同时也试出群臣是真心拥戴年幼的太子的。在王夫之看来，北魏文献帝虽然做得狡诈，但还是“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就是说，黄老之术“贤于申韩也”。接着，王夫之提出，“黄老”之术的末流为“申韩”之术，前者“机诈”，后者“残忍”，其残忍的例子之一，就是宋明帝“贼杀兄弟”。毛泽东大概是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申韩未必皆贼杀”，他举的例子，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诸葛亮，一般来说，曹操、诸葛亮是推崇申、韩法术的，可划入法家之列。

《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所记萧衍篡齐，又别有一番景象。当时，萧衍已有受禅之意，著名文学家沈约和范云都猜到他的意思，先后劝进。沈约说得很白：“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然后，萧衍让范云带沈约第二天再来。临别，沈约嘱范云第二天一定等他，结果第二天沈约自己先到萧衍处去了。萧衍让他起草自己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诏书和人事安排的名字，萧衍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从外面进来，还在那里等沈约呢，看见沈约从里面出来，才知他赶在自己前面进去了，便忙问：对我是怎么安排的？沈约举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当尚书左仆射，范云于是笑了，说：这才和我希望的一样。王夫之对这样的“干禄”“教利学利”的“俗儒”颇为痛恨，称“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毛泽东同意这个观点，所以在批语中进而发挥说，万千个“俗儒”中没有一个是“贤者”，“俗儒”不是真儒，乃是“伪者”；相反，他认为：倒是“过去法家之犹讲些真话”，这是俗儒、伪儒所不能比的。

梁武帝萧衍还以笃信佛教而出名。他创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来源于佛教，附属于佛教。他早晚到寺庙拜谒，讲演佛经，吃素，曾三次出家当和尚，群臣花钱四亿才把他赎回。政治上梁武帝怂恿宗亲权臣乱来，散骑常侍朱异广纳货赂，斯罔视听，远近忿疾，因为善于阿谀，得到萧衍的信任，被重用达三十五年之久。反复无常的侯景叛乱，其中一个借口就是要清除朱异，其实，他们两个都是残暴之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及梁武帝的有关史事时，提出佛老之学同申韩之术的联系，“犹鞞鼓之相应”，因为，佛老“虚寂之甚”，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一切靠“法”来“督责天下”，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超脱“自逸”。结论是：“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毛泽东读至此，认为，



不光信佛老要靠申韩之“法”术来维持，“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看来，申韩的法家治术，在他的心目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倡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体制。联想到晚年毛泽东的评法责儒，也可看出其对法家的褒扬态度。

综上所述，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对通鉴情有独钟。不管是《资治通鉴》，还是与《资治通鉴》相关的书籍，他都认真读，仔细批，并且乐此不疲。

比如，毛泽东在读《通鉴纪事本末》的《石勒寇河朔》一节时，其中有西晋时石勒杀王浚的一段记载，在描述谋士张宾对石勒与王浚的力量对比分析这段文字旁，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天头画了三个大圈，批注道：“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再如，对从牧童、乞食僧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评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这一段史实《明通鉴》有详细记载等等。总之，毛泽东对通鉴及与通鉴相关的史籍都颇感兴趣，并有不少批注。

从他的各种批注中可以看出，在许多地方，他都与通鉴有着共鸣。毕竟，这是一部他从小就深受其影响的书。他一生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就是由这部书引起的。在通鉴当中，有着许多帮助他成为一代伟人的深刻的政治智慧、经济之术和军事方略。通鉴影响了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史论等各个方面的思想。

毛泽东深受通鉴的影响，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一些方面。今天，阅读和研究《资治通鉴》，阅读毛泽东的评点，不仅可以了解毛泽东所受通鉴的影响，了解毛泽东一些智慧的来源，还可以从通鉴中学习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承古启后，继往开来，运用中华古代智慧，开创当代新事业。